

主编

魏华龄
曾有云
丘振声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



漓江出版社

桂林抗战文化
研究文集

(桂)新登字03号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

丘振声 曾有云 魏华龄 编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7.875 插页2 字数385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10册

ISBN 7—5407—0917—6/G·170

定价：10.64元

■ 主 编

魏华龄 曾有云 丘振声

漓江出版社

目 录

序.....	许觉民(1)
序.....	朱 荣(6)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魏华龄(9)
桂林抗日文艺运动发展的几个阶段.....	李建平(18)
论“桂林文化城”在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 中的地位和作用.....	李建平(35)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历史地位.....	魏华龄(58)
桂林文化城的成就和贡献.....	刘寿保(78)
试论党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	韦文华(95)
周恩来是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掌舵人	蔡定国(113)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小说概论.....	雷 锐(128)
抗战时期桂林的诗歌创作.....	李建平(167)
试论桂林文化城戏剧运动的特征.....	蔡定国(180)
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的作用、意义及影响	杨益群(198)

- 抗战时期桂林进步音乐活动述评……… 李建平 (224)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新闻事业……… 彭继良 (244)
文化城的出版事业以及党对出版事业
 的领导……… 魏华龄 (261)
抗战时期桂林的鲁迅纪念和研究概述……… 杨益群 (270)
《野草》——四十年代弘扬鲁迅杂文战斗传统
 的光辉代表……… 苏关鑫 (282)
试论西南剧展在抗战戏剧史中的
 地位……… 邓小飞 吴立德 (290)
西南剧展的历史意义……… 魏华龄 (304)
西南剧展会初探……… 万一知 (320)
“西南剧展”中的旧剧……… 丘振声 (333)

胡愈之对桂林文化城的贡献……… 魏华龄 (342)
简论一九四二年茅盾在桂林的活动……… 李建平 (350)
《霜叶红似二月花》研究二题……… 邓祝仁 (362)
巴金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其成就……… 杨益群 (374)
抗战时期柳亚子在桂林的生活及创作
 ……… 李 耿 李建平 (394)
邵荃麟在桂林……… 魏华龄 (407)
抗战时期艾芜在桂林的生活和创作……… 刁萦梦 (416)
沉雄的号音，质朴的嘲讽与严肃的爱
 ——论艾芜抗战时期在桂林的几部
 作品的特点……… 雷 锐 (430)
司马文森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成就……… 杨益群 (446)
夏衍抗战时期在桂林的戏剧活动和戏剧创作

- 蔡定国 (473)
欧阳予倩抗战剧作述评 蔡定国 (496)
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 丘振声 (506)
田汉抗战剧论及剧作浅谈 杨益群 (515)
志存高远 锐意创新
——试论抗战期间田汉关于戏剧民族形式
的思想 吴辰海 (531)
焦菊隐在桂林 顾乐真 (544)

- 附 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论著、论文要目 李建平 (557)
编 后 (565)

序

许觉民

桂林文化城虽然已是历史陈迹，但人们至今未能忘怀，多年来已有不少回忆录和评述当时文化盛况的文章，并且编印了集子多种。以后就陆续有写出不少研究性的文章，纵论桂林文化城的业绩及其价值，并审视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应有的位置。这类研究既是历史总结也是学术性的探讨，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现在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将这些研究文章蒐集为一书，于读者的参考和研究者的继续思考，无疑都是有益的。

桂林之为文化城，与其说是战争环境所造成，还不如说是当时政治变幻的结果。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使得广西在大后方较之别的地区的恐怖和混浊的状况说来，独见一度获得较为开明的空气，这便是进步文化得以生长的环境与土壤。这方面的论述已有不少文章谈到，这里自不必细说。

值得审视的是在当时繁荣的景象中，有若干特点可供研究。第一，桂林当时的文化盛况包括着社会科学领域的诸多方面，国际、经济、政治、新闻、文艺等方面都呈现着蓬勃的

气象，但其中突出的则是文艺。文艺是沟通人与人之间情感交融的领域，不论从事何种社会活动的人，对文艺都会有共同的爱好。但是在抗战期间桂林文化运动的盛况中，文艺之处于突出的位置，上述理由还是一般性的，最重要的原因，还得从当时具体的政治因素中去寻求。

自1938年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反动当局转入对外消极抗战，对内加紧反共。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迭遭迫害，进步的报刊和书店被封闭以至人员被逮捕。在各地区的广大青年和文化界人士，身陷于恐怖环境中，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在四顾茫茫中，他们企求找到一个可以继续为抗战与进步献身的地方，桂林在当时具有某种特殊的环境，吸引着人们不断地汇集于此，这就为桂林文化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抗战中广大的青年和各界人士，都抱着极大的爱国热忱投入到抗战的大熔炉里来，但是事与愿违，国土一天天在沦陷，敌寇愈来愈凶残，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忧患的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乃是害怕自己的人民。他们怕人民进步，怕人民被共产党的真正抗日实行民主的政策所吸引，于是对凡是要求进步和接受革命思想的人实行迫害的政策。在这种境况中，人们对国民反动派由失望转为愤怒，他们在思想上要求打破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反动统治，要求民主，要求积极抗战。这种思想情绪，进发为人们普遍的情感的流向，人们要抒发这种情感，而文艺恰是最能容纳人们情感奔流的蓄水池，借文艺的形式倾吐人们积郁着的心情，并由此表达出反抗、追求的精神要求。于是戏剧、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的兴起如风起云涌，尤以杂文与诗为最，不论是数量的浩繁还是内容之尖

锐，均为各品类中的突出者。作品之多是应读者的需求而来的，读者的精神需求推动着这一繁荣，作家与读者融合为一体，曲折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桂林文化城中文艺的思想内容和时代内容。

由此可以省悟到文艺的时代内容是时代的固有因素所决定的，不决定于某些人的人为的创造。而且这澎湃的文艺浪潮是无法阻挡的，因为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时代要求，正如将近四十年后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文艺兴旺的大浪潮一样，是时代的需求所使然，而不是什么偶然的文艺现象，更不容某些人一手抹煞。

其次，桂林文化城的重要功绩是文化界群体所共同作出的贡献，其中有老一代的，有中年一代的，也有青年一代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老年尤其是当年处于中年时代的文化界的俊彦，是这一群体中的核心部分或主力。他们有的在桂林耽留不长的时间，而留下的文化踪迹却是久久存留着，如茅盾、巴金、艾青等；有的则较长年月在桂林工作，在文化建树中作出了深厚的贡献，如胡愈之、夏衍、欧阳予倩、田汉、聂绀弩等。不论是久远或短暂留桂的，他们所写出的篇章具有着全国的意义，还影响到港澳、南洋以至遥远的海外。他们是进步和革命文化的一座堡垒，为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妥协、反对独夫政治而发动着猛烈的攻击。不仅如此，他们还以深厚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魅力影响着年轻一代，由此培育了一代的文化青年和新作家。文化是一种思想力和艺术力的传布体，它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为人们所接受后，化为自己的血肉和力量，其中有不少人就进而走入了这群体中而成为一员。桂林新作家的产生是颇为可观的，这必

须认作是桂林文化城的重要业绩。

再次，桂林文化城另一特色是出版事业的兴旺，其出版物和报刊之多，与当年的重庆相较，有一度曾有过之而无不。抗战期间桂林出版的报刊不下七八十种，至于出版图书更多得难以胜计。当时杂志社、出版社和书店林立，在中南路和桂西路一带也是桂林最热闹的地带，密布着很多的书店。这现象标志着人们对文化的渴求，人们的物质生活几乎都是清苦的，经商敛财的有钱人是不会在书店逗留不走的，只有清贫的青年学子和其他的文化渴求者，才会将身上微薄的一点收入，节衣缩食地在那里购求一点精神食粮。这是很动人的情景，不需要任何人去做劝说或作什么广告，而是人们出于自觉的需求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知识。一本新刊物或一本新书出版后，书店就吸引着一大批读者在那里阅读。报刊、出版社、书店和读者已紧紧连结成一片，形成了文化城的一大特色。

就以出版事业来说，出版家依靠着读者与作者，苦心经营，把前几本书陆续销售掉收回资金后，再印下一本。当时的物价飞涨，书的定价印在书上，不可能随物价的上涨而上涨，因此出版社是不大有盈利的，大都靠借贷、欠帐或友人资助而维持经营。至于付给作者的稿酬，有的报刊是无稿酬的，付稿酬的也很难维持作家生活，图书的稿酬并不一次付给，卖掉多少书才结付多少。因此文化人的生活十分清苦，但他们从不为此而诉苦，他们也深知经营此事业之难，只是为了拓展进步文化事业这一志向，清苦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尽管如此，桂林的出版事业却就在这艰难的困境中蓬勃

发展。桂林偏居于西南之一隅，出版物虽可行销部分至四川或东南诸地，就当时的情况说，印数总是有限的。但出版家在同作者的合作之下，也总是力求发行量多一点，为的是在影响上有所扩大和经济上有所裨益。这种与作者共命运的惨淡经营的精神，我认为这一特色是很值得称道的。

由此我想到当前出版界的某些经营作风，是与作者和读者的利益相分离的，其结果就是出书难与买书难。出版者有经济负累之苦固然是应该理解的，但出版工作终究是为了传布文化，而并不是以敛财为目的的。出版社之所以能存在，就其总体说来也还有盈余，据说有的还有很多的盈余，原因是各家都有一部分畅销书赖以支持。倘若出版社能从盈余中匀出部分来印行一些赔钱然而有价值的文艺和学术著作，就可大大缓解作家出书难和读者买书难的困境。但事实上常有种种奇怪现象看到，例如有的竟要作者补贴或资助若干，有的要作者出书后自行销售若干，有的不给分文稿酬，更多的则是因经济原因而拒绝收受稿件。凡此种种风气，与传播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反顾当年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经营作风，诚令人感慨系之了。

上述桂林文化城的三个方面的特点，是看了这本研究文集的篇章以后获知的一鳞半爪的一些感受。事情虽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它在我记忆中的光彩却依然是如此的可亲，已往的情景自然不可能再现，但是温故而知新，却是至今还值得我们从中思之再三的一段史实。

序

朱 荣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反映了广西文艺研究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近年来对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成果。相信它的出版，会推动桂林文化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是我国抗日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宝贵的历史经验。研究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探讨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它在中国抗战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中国共产党对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和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研究文艺和文化工作对人民思想的引导作用等等，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不仅是研究中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历史所必须，更是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文艺和文化工作，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广西从60年代初，就开始对桂林抗战文化进行研究，但比较大规模的开展研究工作，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日报社、桂林图

书馆等单位的同志，先是分别到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南京、昆明、重庆等地搜集资料，访问当时到过桂林的文化人，请他们写回忆录；然后在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的支持下，编辑《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十一本。此套丛书，目前已出版6种。这些工作，为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充分而翔实的资料。

新时期以来，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研究工作者围绕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原因、桂林文化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分期、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重要文化人在桂林活动概况及其成就等问题开展研究，收入本书的一些论文，就反映了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的研究成果，已经作为专著出版。所有这些研究成果，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还有许多方面的研究需要深入开展。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在开拓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如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艺方面，而对思想、文化、教育、出版等领域，则涉及较少。在研究的深度方面，更需要我们努力。可以提出更多的专题，如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关系等进行深入研究；还可以开展多学科的系统研究，从更加宏观的方面，如从中国近现代史、现代文艺史的角度开展研究。特别重要的，是如何把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运用到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中去。这方面的工作，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我希望而且相信，在前一段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桂

林抗战文化动运的研究，必将出现新的突破，取得更大的成绩。

1991年9月1日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魏华龄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38年下半年到1944年上半年这一时期，桂林一度被誉为“文化城”，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就是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而桂林的文化活动之所以出现空前的活跃，是当时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力量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内，集中在桂林的文化人，闻名全国的，也在百人以上。其中，有文化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文学艺术方面，有作家、诗人、戏剧家、美术家和音乐家，这是文化城开展各项活动的重要力量。他们不但对于桂林，而且对整个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和文艺运动，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书店、出版社的建立，有如雨后春笋。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前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共160余家，单1943年，就多达80余家。当时，整个桂西路（现解放西路）两旁，几乎全是书店，成了名副其实的“书店街”。在这些书店、出版社当中，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

社，如《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出版物，对广大读者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国民党、三青团以及一些反动分子所开办的正中书局、前导书局、拔提书店、青年书店、国防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等，虽然也打着“服务”的招牌，实际上却贩卖反动的货色，它们的读者不多，门可罗雀。文化城的出版事业的主导方面，是在党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

由于出版业的发展，桂林的印刷业也随着激增。抗战前桂林印刷厂大小不上30家，大部分属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制书版的印刷厂。抗战以后，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有8家，书版兼彩印杂件的6家，书版兼杂件的12家，彩印5家，铸字2家，装订3家，设备比较齐全。每月可生产用纸1万令到1万5千令，排字生产每月可达3千万到4千万字。印刷业的发展，也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随着出版社、印刷厂的激增，图书、杂志的出版也显得空前繁荣。整个抗战时期，在桂林共出版了200多种杂志，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学、戏剧、美术、音乐、青年、妇女、少年儿童等方面。各类新书的出版，极盛时期每月达40余种，每种新书初版一般印3千册，杂志有的发行达万份，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

还有文化团体之多，文化活动之活跃，在桂林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当时集中在桂林的各种文艺团体和文化团体达二、三十个，另有10多个剧院和电影院。这些文化团体经常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如报告会（讲座）、座谈会、研